# 护国运动的回忆

赵钟奇

我在这里，要先谈一下护国运动前的云南革命的情况。

清朝末年云南当局屡次派遣赴日留学生，在当时，云南留学生在全国各省当中，要算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云南留日学生入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的总计有二十八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大多数参加了同盟会。我当时也参加了。蔡锷在同盟会成立前已毕业回国所以他没有参加同盟会，当时留日学生，特别是参加了同盟会的留日学生，一般都是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的。因此回国之后，他们都从事革命活动。拿云南陆军学生来说，回国后都在云南担任教练官、营长、团长或旅长，或者在新办的云南讲武堂担任教官，或者在军队里面担任工作。这样，他们就在云南军队当中散布了革命种子。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从此就日益普遍和发展。所以当时云南革命的气氛非常浓厚。辛亥武昌起义，云南在革命党人积极活动之下，迅速响应，一举即把当时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赶跑，光复了全省，蔡锷被推举任都督。当时我是在南京参加革命的，打跑了张勋铁良后，我曾任过江苏省陆军第七师步兵第二十五团团长，一九一三年我被调回云南讲武堂担任生徒队长。这时锷因感觉到云南地处边疆，不易施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才华，而当时云南又有宗派主义者出现，随事牵制着他，遂决意离开云南。派其参谋长石泉（汪度）到京向袁世凯请求另调，袁世凯一向嫉视蔡锷，猜忌甚深，此时蔡锷既来请求另调，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乃派其亲信范熙绩来滇。与蔡锷密商，隐许以湘督一席，并希望他到京一行。蔡锷信以为真，不疑是调虎离山之计，曾保唐继尧回滇，继他的任。当沈石泉离开滇后，蔡锷命令我兼代他的职务。宗派主义者，闻蔡调唐回滇，极不满意，而与蔡为难，蔡气愤已极，把督军印章统统交给我，要我替他处理事务，三日后说服了宗派主义者，蔡的气愤始平，复来办公。不料蔡离云南不久，袁世凯便发布了汤芗铭督湘之命，蔡在途中得悉，知为袁世凯所卖，后悔不及，但事已至此，只好到京。到京以后，袁世凯对蔡佯为优礼，给了他许多不重要的职务，便把蔡锷羁縻起来。

由于云南革命气氛非常浓厚，所以自筹安会成立之后，即酝酿反袁，当时留日士官学生一般在军队里已经做到团长之上，而讲武堂毕业出来的学生一般也做到营长以上了。他们都经过辛亥革命的斗争，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革命斗争的锻炼，革命的觉悟非常之高。因此，他们一听到袁氏要做皇帝，就要进行反对。当时这些中下级军官都纷纷写信给自己的长官起来反袁。革命浪潮在军队里面不断涌起。当时我做旅长，驻在大理。我的队伍是直属第一师师长张子贞的。当时我写信给他，他竟置之不理。我莫名其妙。后来才知识他是受了袁氏的运动。原来袁氏派遣了一个特务路孝忱当了他的参谋长。他已经完全被袁氏收买了。唐继尧看见自己部下都坚决反对袁氏，他看见大势所趋，不能抗拒，随着也就反袁了。

唐继尧和蔡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辛亥革命时期，蔡锷

派遣唐继尧率兵北伐，道出贵州，适值哥老会在那里作“乱”，唐即帮助贵州的刘显世平定了这个“乱”事。结果唐在蔡锷支持之下，就当了贵州的都督，后来蔡离滇北上，又保荐了唐当云南都督。所以唐蔡二人一向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自从蔡入京之后，唐和蔡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或者书信来往，或者托人接洽，等到筹安会发生之后，袁氏的帝制阴谋暴露无遗，蔡和唐即更时时以密电相商，共同策划反袁的事情。唐当时一切都表示同意，所以后来蔡来滇，唐即派他的弟弟唐继虞到河内去迎接。

云南原有两师军队，第一师师长就是上面所谈的张子贞，第二师师长是刘祖武。战斗兵约一万七八千人，加上勤杂部队大约两万人。清朝末年曾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购买了新式枪炮。当时购买了两师的装备，后来仅运到一师的装备，计步枪一万七八千枝，每枝步枪当时搭配一千发子弹。因此，子弹很充足。此外，还有很多大炮和机关枪。大炮是后退炮，机关枪是马克辛式的，都是当时极新式的东西，是全国罕有的。大概除了北洋军之外，全国的军队都是没有的。当时蔡锷曾说：“滇军精锐冠于全国。”这话我是完全同意的。

一九一三年，唐继尧自黔省回来，大理有哥老会首领杨春魁勾结当地驻军作“乱”占据了大理，强迫附近的州县要服从他，形势紧张。唐命我前往“讨伐”。当时我任团长，后来杨春魁即被我消灭。唐因此即升我为旅长，从此我即驻在大理并兼卫戍司令。因为当时我在大理，昆明的情况我是不明了的。我是在云南起义后几天，才到昆明。我是隶属于第一师的。蔡锷的第一军原是以第一师作为基本队伍编成的。因此，我的队伍原有编入第一军的拟议。但因为我和我的队伍都不在昆明，因

此，当时就没有编入，后来就编到第三军了。虽然如此，我后来还是和蔡锷在一起的。当时我的部队有两个团，由华封歌、施继伯两人分任团长。华团驻在大理，施团驻在保山。云南起义后，华封歌一团首先开到昆明。他的队伍约一千人。接着我也到来。当时我的部队驻在保山的施团没有调来，唐继尧另外拨李植生一团给我。他的部队也约一千人。编入第三军之后，我任梯团长，华封歌和李植生分任支队长。华封歌因为先到，所以他首先出发。他是开到贵州松坎，和戴戡一同作战的，原来戴戡是随着蔡锷一同到昆明的。蔡锷率领第一军出发之后，戴戡也率着徐进的滇军一营，约五百人赴贵州，组织了滇黔联军，分别在黔北和湘西对袁军作战。他率领的滇军是第三军的部队，徐进原是第三军一个梯团里的参谋，唐继尧临时拨出几百人交给他带去。华封歌这一支队，是由殷承谳带出去的，也是带到贵州，最先在遵义一带屯驻，后来开到松坎方面去参加作战，殷承谳原是蔡锷督滇时的部将，是蔡的亲信人物。当戴戡率领徐进的部队开往贵州之后，华封歌这支队伍，唐继尧是不愿意殷承谳再带到贵州去的。但是，当时把殷承谳感到贵州军力单薄，想再带这支队伍到松坎增加实力，因此，他要把华封歌这支队伍带去。华封歌当时是违背了唐继尧的命令同殷承谳前去的。因此，后来唐继尧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很不高兴。所以后来我到沾益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我说，华封歌违背命令，擅自随殷承谳入黔，此人不可信用等语。

当华封歌到昆之后，接着我也来到昆明。蔡锷是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从昆明出发的。大约他出发后半个月，我也接着出发了。我的队伍原定是要出湖南的。后来因为四川军事紧急，唐继尧又命令我增援四川，但不料到了沾益的时候，适值

龙觐光从广西的百色入寇滇南，并且勾结滇南一带的土匪到处作乱，形势紧急，我又奉唐继尧的命令，中止前进，要折回曲靖，转向滇黔边境的黄草坝，会合黄斐章的挺进军一同去打龙觐光，结果我就经曲靖到罗平，出巴节，在那渡江，江的对岸原有桂军，但当我们渡江的时候，他们自动退走，让我们顺利地渡江，去打龙觐光。这大概是二月底的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出，广西已经快要独立了。但到了黄草坝没有会到黄军，时黄军已过黄草坝，向前直进。我随即向广西前进，到了广西的西林，遇见黄军的殿后部队杨杰支队。时黄军正和敌人作战，首先在阎里打一仗，后来又在黄郎打一仗，均获得胜利。我的军队在西林所属的一个小地方龙潭和龙军相遭遇，大概是已经溃散的队伍吧，人数不多，不过两百人，枪一百七八十枝左右。被我们一击而散，我们缴得枪一百多枝，并缴获现款一万多元。从此，我的队伍一直开往百色，沿途都没有打什么仗，龙觐光自己从广东带来的军队伍不过一千几百人，人数很少。后来沿途招募并勾结土匪。他们的队伍虽号称一万多人，但都是乌合之众，没有经过什么训练，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战争并不激烈。当时龙军先遣部队李文富打皈朝，结果被第二军的张开儒梯团一击而破，龙军即迅速奔跑，他的另外一支部队黄承伯打邱北，后来看见主力既破，兵无斗志，接着也被其他各路军队击败了。当时我在剥隘和张开儒会面，大家说："此后广西没有事了。"百色是在广西独立前一两天被桂军陆裕光、马济两旅包围缴械的。

对龙军战事结束之后，我即回师，仍向贵州前去，听候命令。结果我就率领一个炮兵连和警卫连于四月间到贵阳去，从此我就留在贵阳，至于李植生这一支队伍，没有跟我一同到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阳。当我回到西林的时候，唐继尧命我派李植生去邱北打黄承伯。从此我即和李植生分手，他去打黄承伯，我自己则带着一个炮兵连和一个警卫连到贵阳去。后来李植生把黄打败之后，又回昆明去。他在昆明停留了很久的时间。大概到了六月底，这时候，袁氏已经死去二十多天了，才率领部队从昆明向四川出发。

我到贵阳之后。不久即奉唐继尧的命令增援四川，后来我即到四川去。我是在袁死后的第一天到永宁的大舟驿见到蔡锷的。因为当时袁氏已死，所以蔡锷一见到我，立即就对我说："毓衡！您真是福将啊！您真是福将啊！"我当时感到很奇怪，登时即反问他，他说："不打仗了，不打仗了！袁世凯死了！"这时蔡锷喉病甚重声音已经斯哑，发音很微弱，要靠近他身边，才能听到他的话。我到永宁后一个多月，大概是七月底吧，李植生才到来。这时候，华封歌这一支队也自松坎调来，于是我的一梯团就完全归队了。

当时广大人民都非常痛恨袁世凯，因此护国军对袁氏作战，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的同情和支援。沿途的人民对于护国军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护国军在广大人民鼓舞之下，充分发挥了战斗的力量。他们有着高度的热情和觉悟，因此，作起战来非常勇敢，冲锋陷阵，所向无敌，往往以一当十。刘云峰所部的杨希闵一连人，在后方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曾经抵挡过敌人一个旅。四川人民对于护国军非常爱戴，护国军和他们简直打成一片。护国军纪律非常之好，对于民间财物丝毫不取，他们和老百姓同住在家里，而秩序井然，相安无事。老百姓自己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供给护国军。在前线作战，老百姓担水送饭源源不绝。不但如此，他们还亲到火线上，输送军火，抬运伤兵。

甚至有些年幼的小学生都前来抬运军火。他们到处去替护国军打探敌人的情况，随时报告给护国军。因此，挥国军对于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当时敌人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到处奸淫虏掠，老百姓恨入骨髓。他们都不愿意在敌人所控制下的地方居住，纷纷迁移到护国军的防地来。当四川作战的时候，恰值雨季，敌军生长在北方，习于平原作战。他们的服装很整齐，脚上穿的是皮鞋，打的是绑腿。四川山陵起伏，而又道路泥泞，因此时常摔跤。-护国军穿的是草鞋，他们生长在南方山地，爬山越岭，动作非常灵活和敏捷。护国军运用这些特殊条件，和敌人作战，所以敌人虽然比护国军多出几倍，但护国军始终能坚守防线，使得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艰苦坚持几个月，各省相继响应，袁氏的帝制终于完全推倒了。

（赵钟奇为云南回族，一九〇九年在日本留学时，曾参加“留东清真教育会”。）

本文原载《回族史论集》，（1949—197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

# 关于《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将领爱国回族老人赵钟奇》一文的补充

木从规　纳钟明

编者同志：

贵刊第二十一期刊登王连芳、赵振銮、赵泽光所作《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将领、爱国回族老人赵钟奇》一文，对赵钟奇老先生的家庭情况、到日学习经过，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以及解放后，担任人民政府的工作，都作了简要介绍，本不欲多说，但有的地方漏叙了重要的部分，有的地方还可详为介绍，现本着"三亲"精神作一些补充，以期达到共同研究的目的。

## 一

1906年，赵老相约在日本留学的回族青年36人组织"留东滇真教育会一事，漏叙了核心部分，对赵老担任什么职务未说清楚。（130—131页）

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国内留学于日本三十六名回族青年学生，发起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以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两事为本旨。举保廷梁为会长，黄镇磬、杨光灿为书记，金应豫、白润苍为庶务，巴忠祥、赵钟奇为会计，徐传喜、周在鼎为调查。翌年（1908）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在日本东京出

版了回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刊物《醒回篇》，内容包括发刊序1篇，论说10篇，内地来稿5篇，附杂件4篇。在《醒回篇》中，赵钟奇作《中国回族之来历》及《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两篇。《醒回篇》虽然只出版了第一期，但它集中反映了清末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国思想和爱国主张，进步倾向强烈，民族特色鲜明，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自办刊物之一。（注1）

## 二

“唐继尧病逝后，1927年龙云主持滇政，聘赵为滇西宣慰使，后又委腾越道尹。1931年全国取消道尹制，加上当时国民革命蜕变为军阀混战，先生自度无力回天，随之毅然离政归田。”（137页）。

按：早在1927年8月，龙云虽担任省政府主席，但地位并不稳固，胡若愚及张汝骥所带的部队和西军（唐继尧　唐继虞率领的部队）还在伺机行动，龙曾派出兵力东上进攻，把胡追到陆良，把张围在曲靖县城。唐继虞乘龙忙于应付东线，带领西军三个师，由大理直扑昆明城郊，龙令东线部队回援，才把西军打败，依然退回滇西去了，龙又决定派赵钟奇出任滇西宣慰使，并由赵推荐纳汝珍为中校参谋，协助去调解龙与西军的矛盾。到了1928年3月，收编了唐的部队，唐继虞本人接受了龙云的一笔馈赠，离开云南，这样达到恢复滇西秩序，生产照常进行，这是赵“三上”滇西（注2）。其第一次西上滇西，则为唐继尧1913年12月6日接任云南都督，8日发生了大理兵变，唐命赵老西解决兵变。其第二次西上滇西，系1915年8月，赵钟奇被任命为滇西卫戍司令，又到大理就职。详细经过，原文已有记录，不另赘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13年，全国取消道尹制，但云南地处边疆，普洱道尹改称第二殖边督办，腾越道尹改称第一殖边督办，赵任职后，便是李曰垓。

由于过去赵老曾随李根源参加中缅勘务工作，对于边情较为熟悉，具体表现在中英蛮爱会案。

蛮爱在瑞丽的边境，中英会案地点，每年年终到了规定时间，腾越、龙陵、镇康三县及干岸等五设治局区为范围，英方系以密支那府属之昔董、昔马两厅；新街府属之精弄厅，迤北道属之贵概厅等区域为范围，届时各县县长、设治局局长带同原告或被告到蛮爱参加会审，如一审解决不了，马上由二审再审。赵为二审长官，由于熟悉边情，维护我国边疆人民利益，出色完成任务。李根源曾写诗慰问：

“不惮风霜千里行，
为劳边务重民生，
每逢山水多情处，
便有新诗笔底成。”（注3）

## 三

护国运动以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的暴毙而告终。入川护国滇军留驻四川泸州、宜宾、资中等地，主客关系，日趋紧张，互相混乱。唐继尧坐镇贵州毕节指挥，赵钟奇所部战于叙府一带，曾建议唐力谋收束战局，或可保全未尽之势力，并向唐提出辞职的电文，等等。（注4）

## 四

1964年，先生担任了政协云南省第三届副主席。（139

页）

按：赵老任职省政协副主席期间，曾被邀请参加许多外事活动，其中主要的，如1965年4月22日，朝鲜金日成首相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庆祝活动后，途经昆明回国，朱德委员长专程从北京来昆明，在机场设宴招待，省市党政军负责人、省政协副主席赵钟奇、龙泽汇等被邀到机场参加欢送。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也在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后同苏发努冯亲王回到昆明，朱德委员长到机场欢迎，省市党政军首长、省政协副主席赵钟奇、寸树声也到机场欢迎。（注5）

**注释**

1、见《醒回篇》。

2、见《春城文化报》总第84期。

3、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集》第10册。

4、见《云南档案史料》第5期。

5、见《云南省志大事记资料选辑》第一集中册514页。

# 云南首义讨袁札记

## 万揆一

近十年来，因收集云南护国史料，先后读到几位亲自经历其事的下级军官的有关回忆录。他们翔实地反映了从统帅到士兵维护共和政权、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决心和全力以赴的实际行动，旁及川南战场上的许多动态。这些回忆录，分散刊载于有关报刊，并未集结成书。时至今日，已不易查找。为保存研究护国的资料，特再联系护国时期一些为人忽略的零散文献，整理成本文，以志护国运动八十周年。

### 唐继尧勖勉出征将士

护国军的编组，早于1915年12月25日正式通电讨袁前，即已着手进行。由本省两个陆军师中，抽调精悍营、连，先组建护国第一军。

第二师所辖步兵第五团一连，原驻防滇西南镇康。1915年12月22日，接获营部下达的命令，略谓省电通知，限该连于1916年1月10日以前，赶赴省城报到。如期到达昆明，当晚即改编为护国第一军第十团第一营，日内出发。

开拔前，护国军都督唐继尧，在五华山开武亭前，召集出征官兵讲话。

第一连中尉排长戴锡琨，曾速记下唐氏讲话，后来发表在他写的《云南护国首义二十一周年纪念感言》一文中（以下引号中为原记录）。

唐继尧告诉大家，云南护国能否成功，有“两大关键”。即：袁世凯是否罪大恶极？滇军是否精锐？

唐氏认为：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确是罪大恶极，肯定要遭受全国人民反对。因此，云南出师讨袁，一定会得到全国“言论上、政治上、财政上的补助”。这样，云南护国“已算成功了政治上的一半。其余一半，就全靠护国军在战场上的取胜了。

唐继尧指出：如果不发奋图强，“打一仗败一仗”，那么，同情起义的省份就会犹豫观望，听任“北军饮马滇池”，如果群策群力、奋勇进步，打了胜仗，“马上就会引起若干省的独立，反对袁世凯！这就是“其余一半”的内涵。他希望大家明确“打铁须要本身硬”的道理，努力使“滇军能够精锐”。这样，“有袁氏之罪大恶极，即有举国人之助我；有滇军之精锐，即有他省省独立”、“两半合之，是之谓全功！”

唐继尧流露出护国必然成功的信念，并与“直接出兵的下级官”们共勉。

## 赵藩的“四不”观点

随着袁世凯复辟的加紧步伐，不断有反袁志士来到云南。于是，反袁阵线中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云南军政界方面，既有原同盟会员，以及该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员，更有原投靠袁世凯、被抛弃后始进行反袁的进步党人，如云南巡按使（省长）任可澄即其中之一。外来人士中，也

有孙中山派来进行反袁联络的中华革命党员吕天民(志伊)。

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在反袁阵线中所占比重较大,拥护共和的态度最坚决。进步党在其党魁梁启超的主持下,虽也反袁,但却怀有政治野心。——攫取讨袁领导权,作为进一步攫夺权利的资本(在梁启超左右下,日后抑唐扬蔡,篡改历史,把护国讨袁说为该党发动,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

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后,袁世凯派到云南来任职、兼进行刺探地方情报的官员(如阿迷县知事张一鲲),形式上也成为反袁阵营中的一员。

在这样的情况下,形势就变得更为复杂了。思想有新有旧,籍贯各不相同,党见相互矛盾,还有些原属于袁政府派来的官员,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显露,他们也有着反对复辟的思想,可是,却受到猜忌,不能为讨袁出力……。种种情况,不一而足。

护国第一军第一梯团刘峰所属邓泰中、杨蓁两个支队,11月13日"首义前第三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即先后向川边进发,称为"先遣梯团"。蔡锷率二、三两梯团离昆赴川前夕,他在水晶宫八省会馆(护一军总司令部设此)设宴,招待各界有关人士。目的在于听听大家对护国第一军各个方面的意见。

赴宴人数超过一百,时任图书馆长、辑刻《云南丛书》处总纂的赵藩,被护国军都督府聘为参议,也是蔡氏的座上客之一。

反袁阵线中意见矛盾的事实,如外来人士议设元帅府、滇中人士力主设都督府,赵氏早有所闻。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护国军内部的"排外思想"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因此,他认为,这对反袁大业的推进是不利的。只要真心诚意反对复

辟，未知袁世凯同流合污，就应当大公无私，予以信任、任用。这样做，有利于护国讨袁，维护共和。

就在宴会上，赵藩就用人一事，向蔡锷作出四点建议。

用今天的话来说，赵藩的建议具有“统战”意义。他的话，两个月后由《义声报》总编辑惠我春归纳为精辟的九句话，连同蔡锷的反应，在《赵樾村先生之名言》一文中透露出来：

月前，蔡松坡招饮。不忝参末座，滇父老相至亦百数十人。有烦，越樾村先生向蔡公语曰：“今后用人行政，须不分新旧，不分畛域，不存党见，不咎既往。豁然大公，无所不容。民国前途，实利赖之！”言甫蒇，举座动容，蔡公尤深然其说。迄今思之，洵老成硕彦之见哉。特书之以志景行。

蔡锷统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属于中路主力。宴会后，于1月14日出发，由滇趋永宁取泸州。

## 护国第一军出川

出师讨袁，护国军兵员短缺。因此，从1915年12月到次年1月上旬，各团营不得不“自行添补新兵”。

云南拥护共和，深得民心，各中学的学生们，纷纷投笔从戎，成为新兵的来源之一，兵额问题解决了，但初参军的学生缺乏军事知识，毫无战斗经验。这就成为护国军将校们面临的新问题。

护国军由昆明出发后，逐日抓紧在出发前、宿营后、或日常例假期间、训练新兵。据载：“每日必有点半钟的操作，虽道途大雪纷纷，亦未间断。”

军中的连排长们，多数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文化素质较好，他们认识到云南首义讨袁的意义，在日常勖勉士兵奋

勇作战的同时，还坚持进行纪律教育，使护国军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行军途中，沿途旅店、马店供不应求，一部份队伍只能借住民房。军令：不准损坏民家一草一木。次晨开拔前，住室必须打扫干净，每名士兵，付给房主人二仙（分）到三仙的房钱。良好的军纪赢得沿途居民的敬重。没有入驻护国军的人家，甚至感到懊丧。

雪中行军，全军作一路纵队前进，从来没有人掉队。戴锡琨所在的连队，“有大半失去草履，仍不见有人落伍”。

蔡锷渡过赤水河后，送给渡口船家银圆一百元，并要他不必拒绝后来渡河的军队付给的船钱。可是，船家事后对过河部队都拒不收费，理由是“蔡总司令已经一次付过，不能重收”。而过河连队诚恐违反“不给船资”的军纪，却一再坚持付钱。双方你推我拒的争执，每天都发生着。

## 在川南战场

1916 年 2—3 月间接川南鏖战，戴锡琨写有《棉花坡阵中日记》，炮兵连长孟雄成则写有《战斗间趣谈》，生动地记下了他们的战地见闻（按：戴锡琨毕业于讲武学校，后来历任营、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在滇黔绥署供职，任《军事月刊》主编；孟雄成亦为讲武学校毕业生，任护一军炮兵连长，1916 年 9 月在四川资州阵亡）。

护一军于 1916 年 1 月 31 日进入四川，抵达永宁（叙永），2 月 4 日进抵纳溪，不久便和敌军开始交锋，双方互相用大炮轰击。川东南地瘠民贫，在战火间歇时，不少农民都冒着生命危险，到战地捡拾弹头。他们告诉护国军：每天如果捡得“铜

壳”两斤，售卖后就能解决几天的生活费用。他们终日在战地往来，却很少有受到流弹击伤的人。

敌人为了掌握护国军的动态，派出大量间谍、便衣深入护国阵地，刺探军情。甚至还用青年女性充当侦探。她们“服饰奇冶，举止妖艳”，向护国军战士卖弄风情。一经查觉后，即就地枪决。

两军间的前沿阵地，距离接近。双方官兵在战壕中谈话声音略高，对方都能听到。甚至在战壕中“互相诟骂”。

在棉花坡，护国军炮兵阵地既接近敌军，也接近友军步兵。炮兵发现目标后开炮轰击，是否命中目标，不容易掌握。后来和步兵协议，如果炮弹命中敌阵地，我方步兵就拍手叫好，以这种方式向炮兵通报信息。有时，步兵高声叫“好”的时候，敌方阵地上的士兵就全部跑开了。

2月下旬，战事逆转。3月初，北洋军两旅兵力，由白沙场、中场两路反攻叙永，同时逼近。护国军只用三个营，分头扼守。因北军实力远超于我，不得不分段撤退。在白沙场到叙永间阻击北军的一个营，撤退命令分段下达。因战线过长，传令不周，没有接到传达的士兵，子弹打完后，全部壮烈牺牲。

中路护国军为“休养兵力，重整建制，分散北军”接着主动放弃纳溪，总部行营移设大舟驿，第二梯团则驻防大舟驿前30里的下层圃地方。

纳溪撤退时，当地人民扶老携幼，和护国军一道转移。蔡锷为此，下令全军不得“故闯人民”。因此，全军都走在路边，不和民众争道。

尽管小有失利，但护国军的士气依旧旺盛。总部移到大舟驿后，永宁附近驻军有一份要电，因电线故障不能发出，只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